

市场演进、职业分层与居民政治态度*

——一项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

□李 明 潘春阳 苏晓馨

摘要 :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商品市场先行发育,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缓慢演进的。理论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越大,人们就越有可能认识到个人努力对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越小,从而能在弱化激励的同时,诱发出对政治体系的不满。以中国市场演进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为前提,本文在运用 CGSS2005 数据进行职业分层,并采用 Oaxaca-Blinder 分解法测算各职业阶层社会剥夺指数的基础上,检验了源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剥夺效应对居民政治态度的影响。

关键词 :市场转型 劳动力市场分割 社会剥夺 政治态度

从寻找转型的行动者的视角出发,市场转型理论在早期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中欧分别走出了 3 条不同的转型道路,但随后它们又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各国走向趋同(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2008)。理解这一转向的关键,是 Szelenyi(1996)对 3 种类型市场渗透的区分。根据此区分,中国在 1977~1985 年处于地方市场发展的阶段,1986 年步入混合经济阶段;1996 年后由于全国性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出现,与其他转型经济一起同步走向资本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了各国转型道路存在趋同的结论。

可能正是受这一理论的启发,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才构成学者们检视包括中国在内众多转型经济的核心视角,而这其中劳动市场尤为研究所关注。比如众多学者就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比较考察了转型前后中国社会的分层情况,重点关注家庭背景和一些制度性壁垒对职位获得及不平等的贡献。作为发现之一,相当多数的学者都注意到,迄今为止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严重分割,并且与众多工业化国家甚至其他转型经济不同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户籍、社会福利供给等制度性区隔引发的(赖德胜,1996),广泛体现在地区、城乡、行业等壁垒间。已有研究着重从恶化收入分配关系、抑制产出和就业,妨碍经济效率提升等角度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负面经济效应(赖德胜,1996;李建民,2002),而对其政治、社会负面效应关注不足。

实际上,探讨政治、社会现象背后经济根源的研究思路至少可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 Becker 作为当代考察歧视等一系列行为经济根源的集大成者,更对其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他们的启发,当然也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社会学家 Bonacich(1972)在分割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考察了族群对抗的经济原因。Bonacich(1972)指出,族群对抗以排斥运动与等级制度两种形式存在,其经济根源存在于以族群界限划分的劳动力市场中。具体来说,族群冲突并不必然存在,它发生的机制在于,移民之间、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之间存在资源和动机方面的差异,并且由于移民所持劳动合同主要是在迁移之前达成的,缺乏充分的参照信息,最终造成既有劳动力市场对新迁入劳动者的排斥运动或等级制安排。

* 感谢陆铭教授、陈钊教授、王永钦副教授和范子英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候选人赵剑治对本文的意见和建议。本文曾分别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报告过,感谢韦森教授、任晓教授、任远教授、陈明明教授、纳日碧力格教授、陈玉刚副教授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评论。文责自负。

可能引发族群冲突,是分割劳动力市场政治和社会后果的一个特殊事实。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在政治体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自上而下推动经济转型的(Blanchard O. and A. Shleifer, 2001),它的劳动市场演进充分体现出强制度介入的特征,其分割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之一,是很有可能使得受排斥或等级制约的社会群体产生消极的政治态度,表现为根据受剥夺程度的差别,对公共政策效果持不同的评价。就我们掌握文献所知,本文可能是首支尝试把劳动市场演进过程中的制度性分割(进一步来说,把转型路径选择)与居民政治态度建立起因果联系的文献。当然也已有学者发现,转型后的俄罗斯与中欧居民对前社会主义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别。在俄罗斯,人们表现出对前苏联时期生活模式的深切怀念,并保留着对前苏联的符号记忆。在中欧,类似的符号则仅在博物馆中充任悲剧的标尺被展览(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2008)。现有的观察倾向从俄罗斯与中欧曾经的殖民与被殖民经历来理解这一差异,不过如果深入思考它们各自的转型轨迹——俄罗斯是通过一条“只产生了资本家阶级而未有资本主义体制”道路走向后社会主义,中欧是经一条“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式”走向后社会主义,从而迄今为止俄罗斯依然政治资本主义盛行、贫富差距悬殊,我们也能体会转型路径选择与政治记忆之间的关联。

文章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紧接着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政治态度的定义、测度,及在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研究政治态度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在劳动市场演进的框架内介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及其对社会分层的含义;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所用的数据、变量及实证所用的策略;第四部分报告了文章的回归结果;最后为文章结论及讨论部分。

一、政治态度 概念、测度 及研究意义

政治态度是行为人基于对政治系统主观要求与现实之间满意度差异而表现出的对政治系统的态度,或者由之派生出的参与政治系统的行为准则。实质上,政治态度是社会态度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演绎,后者指行为人对特定制度安排或社会刺激(Social Stimuli)的一系列倾向性反映及所可能采取行为模式的集合(Lapierre, 1934)。已有文献对政治态度内涵的概括如下:(1)它是行为人对心理客体

的有组织的倾向,(2)经学习而获得,并经进一步的学习而改变,(3)体现了信息处理的结果,影响行为人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判断(王丽萍,2006)。

政治行为人的心理客体极为丰富,已有研究测度政治态度的方法也因此多种多样。常见的一种测度政治态度的方法,是根据行为人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在自由——保守维度上标出一套政治态度系谱。比如Fleishman(1986)就曾通过对行为人对12个问题答案的聚类分析,在自由、半自由和保守3类之外,另区分出了倡导有限政府等另外3类,实际上把政治态度归成6类结构。郭正林(2005)曾通过农民对村干部选取的倾向、对村庄社会权威的认知、对党群干群关系的变化、对基层民主发展的信念与支持4个维度考察了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Wang等(2005)也透过对国家政治活动关注的情况,对民主化、政治参与、体制改革和腐败的看法等几个维度,研究了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态度。Tedin(1974)亦曾透过答卷人对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程度、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政策及有关大麻吸食方面立法3类问题的认知,在美国背景下辨析父母的日常传输是否会影响到子女政治态度。

即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测度行为人的政治态度,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在中国测度居民的政治态度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鉴于政府是一个常见的行为人的政治心理客体,且一定程度上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对转型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本文尝试通过人们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来界定其政治态度。理论上,该方法遵从了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系统中政治信任的强调。戴维·伊斯顿提出,政治系统必须得到政治成员的支持,其中政治系统产生公共政策是否符合政治成员的要求,是政治系统获取特定支持的关键。实证中,张翼(2008)的研究也曾把不同社会阶层对当地政府工作的评价作为构成其政治态度的一部分。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其中涉及政府公共政策效果评价的问题计9项,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共抽取4项因子,用以测量居民政治态度。

由定义可知,至少可以从行为人及其心理客体两个视角考察影响政治态度的因素。心理客体方面,影响政治态度的因素包括一系列政治性制度安排或社会刺激,而这些制度安排或社会刺激之所以可能在不同行为人中产生不同的评价,除利益需求不同外,很大程度上还源于行为人学习和处理信息

能力的差异。就本文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对不同个体和群体政治态度的影响是考察的关键。

政治态度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有重要意义。首先,转型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居民是否最终受益,看居民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即是要看人们的政治态度。其次,已有转型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绩效是转型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人们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是研判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尺。Blanchard等(2001)在评价中国与俄罗斯转型绩效差别时认为,中国垂直向上负责的政治结构使得中央更能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掠夺之手,是中国优于俄罗斯的原因之一。施莱佛(2004)更曾指出,俄罗斯与波兰两国政府绩效差别是理解它们转型绩效差别的一个重要视角,其采用的考察政府绩效的指标,恰是两国居民对其政府治理的评价。政治态度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一个“充分统计量”,是进一步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最后,劳动力市场作为影响社会分层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是高度分割的,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各阶层间持续的收入差距,很有可能会在人们的心理上有所反映,特别是鉴于正式制度所起到的作用,这种反映很有可能直接指向政府的公共政策,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但现有研究却未曾对此给予必要的关注。

二、市场演进与社会分层：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商品市场先行发育,继而要素市场缓慢演进的。就劳动力市场来说,它的不断完善本质上是劳动力不断商品化的过程。基于此,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的论述,就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劳动市场发育轨迹的有效工具。马克思指出,劳动者拥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85),仅当两者同步演进时,劳动力市场才能得以出现并不断完善。

为推行赶超战略,中国在转型前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村与城市分割开来。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保证了农民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当然农民更无条件自由出卖劳动力;在城市中,劳动者按照劳动人事部门的统筹管理与公共生产资料相结合,也无择业自由。所以总体来看即便当时中国是城乡分割的,但由于劳动力未能商品化,也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转型展开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成农民早期在逐步获得择业自由的同时,开始自主选择与农业生产资料相脱离,最终在乡镇企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目

前,城市化正成为推动农业劳动力与农业生产资料相分离,并彻底实现商品化的核心动力。在城市,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改革到战略性重组,推动着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与公共生产资料相分离,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

可以说,继商品市场之后,无论是从劳动者迁徙及择业自由的获取来看,还是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来看,中国劳动市场发育和完善的各个环节都有广泛的正式制度介入,演化出的劳动力市场也因此具有制度性分割的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体现在:(1)目前,虽然总体来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已不是最为严峻的问题,但由于附着于户籍上的社会福利政策存有区别,农民的流动依然面临较强的约束。与此相关,即便农民(甚至它市居民)迁移到城市,也会在城市形成一个新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杨云彦等(2000)早期在武汉市的发现支持这一论断。(2)行业、所有制等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Shi(2007)比较早报告了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陈钊等(2009)提供的一个解释认为,这与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战略密切相关。以1996年为分水岭,他们指出中国早期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增量调整为主要内容,劳动者普遍受益;而后期改革则主要通过国企富余职工下岗分流为主要内容的总量调整来实现,且率先从竞争性较强的亏损企业开始,以至增长仅惠及仍留于体制内、垄断性较强行业的在职人员。所有制方面,尹志超等(2009)证实公共部门较非公共部门工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扩大;梁玉成(2006)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中国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职业流动鲜有发生。(3)职业间分割日趋加深,本文将提供证据。

世界银行(2004)曾通过地区间工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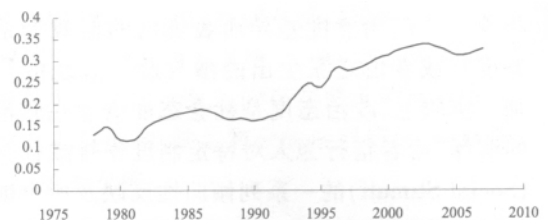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历年各地区工资变异系数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作者计算得到。

的变动情况,来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趋势,其逻辑是如果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则地区间工资水平将趋向收敛,否则则意味着分割在不断强化。据此我们在图1描绘了历年地区间工资变异系数的变化情况。总体来看,1990年起地区间工资离散程度明显增强,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一定程度上趋向增强。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客观上挑战了社会分层的工业化逻辑。西方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职业分化越来越大,人的社会地位流动将越趋向常态,知识和技能越来越成为个人地位获取的关键变量,这被称为工业化逻辑下地位获取的自致机制(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2006)。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则意味着,个体或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的获取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行为人的个人努力,社会排斥和等级化将影响深远。这里等级化机制有别于排斥机制,排斥机制是指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存在可不以其他群体的存在得以存在和发展,故前者可通过排斥运动阻止他群体的进入;等级化机制以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为前提,通过等级控制来达成,两者共同构成基于社会结构地位的客观剥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可能引发族群冲突的逻辑相仿,无论等级制还是社会排斥都有可能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的意识中得以反映。

基于一二两节的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转型至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呈现出高度的制度性分割的特征,不利于和谐的社会职业分层。具体来说,受剥夺程度越高的职业群体,其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越低,政治态度相对消极。

三、数据、变量介绍及实证策略

(一)数据介绍

本文分析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及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联合调查并公布的2005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05)。数据抽样设计利用的总体信息主要来源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抽样方案采用分层设计、多阶段PPS方法,抽选约10000个城乡住户样本(不含港、澳、台及西藏)。由于旨在考察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居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所以本文在选取调查时居住地在城镇居民为考察对象的同时,剔除了不在劳动力市场且未报告职业信息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3662个。

(二)职业分层与社会剥夺指数

受韦伯分层理论的影响,已有研究日益倾向通过职业、教育、收入水平或加权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等指标进行社会分层研究。在Wright(1997)的基础上,刘欣(2005a、b,2007)曾结合中国转型过程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社会分层的多元制度基础的理论。

根据刘欣的分层方法,把所用数据库个人职业与行政和

管理级别、技术职称等信息相结合,本文把社会阶层分成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9类。与刘的方法不同的是,参考Bian等(1996)对与市场高度关联职业、再分配权力性职业及高度依赖再分配权力职业的分类思路,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把GB2003职业编码中任职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的有无行政级别的办事人员,如警察和部分有职称消防人员也归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行列,专业技术人员也做了类似处理。同时,对任职国有企业且职务明确为GB2003职业编码第一大类,但的确又无行政级别的职员,我们也归入国企经营管理人员行列。专业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的划分在GB2003职业编码大类的基础上又考虑了技术职称的差别,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归入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的分类同时兼顾职业与技术。

表1第二列报告了我们分类出的各职业阶层的样本量和占比情况。由于本文考察对象为居住地在城镇居民,所以农业从业人员占比较低。第三列分别报告了各职业阶层的年均收入及变异系数,表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收入水平在9类阶层中最高,农业从业人员最低。收入变异系数普遍较小,表明我们的职业阶层分类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相对来说,非国有企业经管人员、业主及个体户阶层收入变异系数稍大,表明异质性相对较强。

工业化社会分层逻辑以劳动力市场的
表1 职业阶层类别描述及其收入分布(单位:元)

职业类别	占比(%)	年收入水平	
		Mean	C.V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3.9(141)	20835(137)	0.7
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2.3(83)	19390(81)	0.63
专业技术人员	18.4(672)	19725(641)	0.96
非国有企业经管人员、业主及个体户	13.9(509)	18029(489)	1.56
服务业从业人员	18.6(681)	12346(660)	1.04
办事员	6.1(224)	12779(220)	0.76
技术工人	14.7(536)	15222(524)	0.73
非技术工人	20.4(746)	10061(727)	0.92
农业从业人员	1.7(62)	7411.4(59)	1.04
总计	100(3654)	14859(3538)	—

注:括号内为样本量;CV为变异系数。

充分竞争为前提,体现为人力资本(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等)及其他一些外生因素是地位获取的核心变量。遵从其逻辑,同时也参考一些分解部门间收入差距的研究(Démurger et al., 2009),本文采用Oaxaca-Blinder(1973)分解法,把职业阶层间收入差距分解成由工业化逻辑可解释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剥夺效应可解释两个部分。经典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要求分别估计不同职业阶层的Mincer收入方程(1),其中X包括教育年限、工作经验这样的解释变量及性别等控制变量:

$$\ln y_i = X_i \beta + \varepsilon \quad (1)$$

令*i*及*j*分别表示不同的两个职业阶层,对(1)式取均值并做差,得(2)式:

$$\overline{\ln y_i} - \overline{\ln y_j} = (\overline{X_i} - \overline{X_j}) \beta^* + \overline{X_j} (\beta^* - \beta_j) \quad (2)$$

(2)式右边第一项是收入差距为工业化逻辑可解释部分,第二项为劳动力市场分割背景下由剥夺效应解释部分。式中 β^* 取值不同易引发所谓的“权重问题”(Index number)(黄志岭、姚先国,2009),Cotton(1988)和Neumark(1988)分别提出不同的方法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不过仍有争辩。Wellington(1994)因此提出,全样本回归系数对数据奇异值不敏感,可用全样本回归系数代理 β^* ,以尽可能避免“权重问题”,本文 β^* 的选取遵从了这一思路^⑩。进一步,在计算过程中(2)式中右边第二项可视为和与第一项之差,采用这一处理方法的好处,是它的计算只需样本均值,避免了分组回归中存在的样本不足问题。

表2报告了全样本回归的情况,为尽可能避免再考察就业时间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控制了就业状态变量,以全职就业为参照,依次为半职就业、临时性就业和兼业务农。受教育年限参照Xie等(1996)的方法进行处理^⑪。相较模型(1),模型(2)增加了户口性质、政治面貌和部门虚拟变量这些文献中经常用来表征制度分割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这些控制变量都对收入差距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且也比较符合预期。由于本文旨在通过(2)式在控制住与工业化逻辑相符解释变量后分解出源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剥夺效应,所以选用模型(1)的回归系数来代理 β^* 。

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为参照组,我们分别把其余8类职业阶层对应变量均值带入公式(2),可得出对应的社会剥夺指数。图2报告了分解结果,根据Dougherty(2005)的建议,参照组社会剥夺指数设定为0^⑫。计算结果表明,受剥夺程度最高阶层为办事员阶层,其次为农业从业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之所以受剥夺程度最高,原因在于该阶层实际上人力资本存量相对较高,但收益率却相对较低。比较有意思的是非国有企业经管人员、业主及个体户社会剥夺指数为负。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是,一方面该阶层人力资本收益存在溢价,另一方面可能是在财富的作用下,该阶层对相对其他社会阶层有相对多的剥夺机会。

(三)政治态度测度

依据第一节对政治态度的定义及测度的介绍,本文选取居民对若干代表性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来测度其政治态度。CGSS2005问卷中有“您对政府在下列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否满意呢?”一题,共9项,分别涉及对政府公平执法、秉公办事、医疗、老人生活保障、基础教育、环境保护等内容(详见表3),答案依次都设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和无法选择6项^⑬。与张翼(2008)通过对每一答案赋予分值,然后加总政治态度的方法不同,我们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来测度居民政治态度。因子分析的KMO检验值为0.884,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20770(P<0.001),表明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通过对以上9项政治态度指标进行

表2 全样本回归报告

	模型(1)		模型(2)	
	非标准化系数	Sig.	非标准化系数	Sig.
性别				
女性=1	-0.466	0.000	-0.487	0.000
户口				
农业户口=1			-0.116	0.000
政治面貌				
党员=1			0.032	0.386
教育年限	0.064	0.000	0.062	0.000
性别×教育年限	0.02	0.001	0.022	0.001
年龄	0.012	0.058	0.014	0.021
年龄平方/100	-0.015	0.051	-0.018	0.025
部门变量				
公共部门=1			0.097	0.049
国有企业=1			0.003	0.94
私营部门=1			0.16	0.000
地区变量 ^⑭				
东部地区=1	0.336	0.000	0.328	0.000
直辖市、省会=1	0.184	0.000	0.187	0.000
就业状态				
是			是	
常数项	8.362	0.000	8.247	0.000
N	3517	—	3470	—
F值	180.3	0.000	120.8	0.000
调整后R平方	0.338		0.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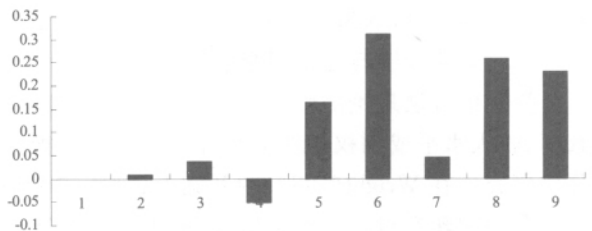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各职业阶层社会剥夺指数
注:职业阶层1-9依次对应表1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到农业从业人员9个阶层。

主成分分析,并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我们得到表3的分析结果。根据旋转后特征值取值情况,我们选取4项因子度量居民对政府有关公共政策结果的评价,根据因子载荷情况,分别命名为公共施政因子、社会基础设施因子、社会安全因子、环保和公平因子,四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达78.338%。实证分析中我们分别把以上四因子转换为1~100的标准分值;同时也根据各自方差贡献率加权出了总的政治态度因子。表4报告了转换后因子得分情况,总体来看因子得分都不太高,尤其是对社会基础设施及社会安全这些与居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公共品供给效果评价一般,标准误显示居民对这两者的评价较为同质,而公共施政及环保、公平则异质性较强。

(四)实证策略及变量介绍

本文旨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背景下,检验剥夺效应对居民政治态度的影响。在对社会剥夺指数和政治态度测度的基础上,实证问题即是要在控制有关变量的基础上,查看受剥夺指数对居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本文涉及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如下。

以虚拟变量处理的变量包括: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组;户口,以城镇户口为参照组;婚姻,以未婚或离婚为参照组;政治面貌,以非党员为参照组。

年龄,用2004减除出生年计算得出;教育年限,以Xie等(1996)的方法进行处理^⑥。社会剥夺指数,根据职业分层结果,我们把处于同一职业阶层的每一从业人员赋予相同剥夺指数,指数计算及取

表3 政治态度因子分析结果报告

自变量	因子命名					共量
	公正施政	社会设施	社会安全	环保、公平		
公平执法	0.839	0.247	0.22	0.175	0.777	
政府部门秉公办事	0.828	0.252	0.124	0.246	0.768	
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0.265	0.832	0.072	0.091	0.651	
为老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	0.23	0.818	0.131	0.167	0.851	
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	0.124	0.652	0.423	0.179	0.709	
捍卫国家安全	0.145	0.178	0.883	0.138	0.844	
打击犯罪	0.569	0.17	0.589	0.101	0.824	
环境保护	0.211	0.145	0.179	0.907	0.92	
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	0.509	0.369	0.064	0.554	0.707	
特征值	2.176	2.13	1.427	1.318	—	
方差贡献率	24.175	23.663	15.854	14.646	—	
累积方差贡献率	24.175	47.838	63.693	78.338	—	

表4 居民政治态度情况描述

	公正施政	社会基础设施	社会安全	环保、公平	政治态度
均值	54.825	45.602	48.936	51.526	48.85
标准误	14.561	12.041	12.947	14.259	16.553

值已分别由公式(2)及图2给出。

与已有文献简单控制主观社会阶层的做法不同,在本文我们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轨迹(Trajectory)进行了控制。分别定义如下:与同龄人相比自己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取1;与3年前相比自己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了取1。做这一调整的原因有二:其一,行为人的态度更主要地受其参照系影响,与同龄人比及与自身3年前情况比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情况能捕捉这一信息^⑦;其二,该两项变量也经常是既有文献用于代理相对剥夺感程度的变量。

此外,本文还对就业状态和地区变量进行了控制,就业状态以全职就业为参照组,含兼职务农、临时性就业和半职就业3类;地区变量分东部地区和直辖市、省会省市。

四、社会剥夺与居民政治态度:实证结果

表5报告了本文的实证结果,其中模型(1)~(5)中被解释变量依次对应表(4)中4项政治态度得分及加权后居民政治态度。

在控制住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政治面貌、教育年限等变量的影响后,性别及户口性质在不同模型中显著程度及符号都有差异。其中女性身份使其

表5 社会剥夺与政治态度:回归报告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性别					
女性=1	0.985**	-0.408	-0.484	-0.308	-0.031
户口					
农业户口=1	1.607**	-0.254	-0.59	1.129	1.075
婚姻					
已婚=1	-0.136	-0.667	-0.5	-0.693	-1.18
年龄	0.015	0.016	0.03	0.007	0.041
政治面貌					
党员=1	1.475*	-2.144***	0.361**	-1.774**	-0.792
教育年限	-0.084	-0.074	-0.239***	-0.140*	-0.298***
社会经济地位					
与同龄人比					
较低=1	-1.551***	-0.772*	0.399	0.279	-1.368**
与3年前比					
下降=1	-1.515**	-2.784***	0.293	-0.731	-3.456***
社会剥夺	-4.180***	-1.366*	-1.882	-0.121	-4.972***
就业状态					
兼职务农=1	-1.596*	-1.770**	-0.753	-2.329**	-3.895***
临时就业=1	-0.573	0.84	-0.719	-1.241*	-0.6
半职就业=1	2.062	2.515**	0.239	-0.618	3.310**
地区变量					
东部地区=1	-0.892*	2.066***	-1.914***	0.831*	0.449
省会、直辖市=1	-0.596	-1.952***	-0.323	0.704	-1.855***
常数项	56.338***	47.648***	52.390***	53.001***	53.914***
N	3637	3637	3637	3637	3637
F值	3.496***	7.233***	3.532***	1.880**	5.533***
调整后R平方	1%	2.30%	1%	0.30%	1.70%

注:***、**、*分别代表在1%、5%、10%以内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中调整后R平方较低,不过这也是有关态度实证文献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想象。

对政府公正施政有正向评价,而对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安全、环保和社会公平评价负面。一个可能的解释源于女性的家庭地位——女性更多地与教育、老人生活保障、医疗和社会安全发生关联,也因而有更深刻的生活体验,所以评价较低;与此同时,对政府是否公正施政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疏离,因而评价正面;但总体而言,女性政治态度不甚积极,但系数不大且不显著。户口方面,农业户口居民对政府公正施政有显著且较强的正面评价,与已有的发现类似(张翼,2008;李培林、李炜,2007);同时,同样可能源于对教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安全的生活体验,它们对公共政策的社会基础设施及安全效果持负面评价;不过总体而言,尽管不显著,农业户口居民政治态度还算积极。

比较有意义的两个变量是政治面貌和受教育年限。在政治信仰比较自由的前提下,个人对政治面貌的选择本身就能体现其政治态度,从而理论上党员相较非党员应持更正面的政治态度,不过这仅能在模型(1)和(3)中得到印证,而对政府社会基础设施提供及环境和社会公平政策,党员则评价负面。一方面,这可能表明在我国人们并非仅按照其政治信仰选择政治身份,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党员对社会现状有特殊的认识。教育程度方面,已有的理论认为,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态度的理性化程度越高(李培林、张翼,2003),对社会现状的评价越客观,但模型(1)~(5)却毫无例外地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政治态度越消极。但就系数和显著性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政府施政情况以及社会基础设施提供评价尽管呈负面,但不显著;但它们对政府在社会安全、环保及社会公平方面所做工作则有显著负面态度。后者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可能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群体有相对更公共性的视野。

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轨迹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也大体符合人们的预期。首先,社会经济地位较同龄人较低,及较自己3年前下降,都显著冲击居民对政府是否公正施政、社会基础设施提供情况的评价,而社会安全评价则无类似效应。如果采用这里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轨迹作为相对剥夺感指标,那么模型(5)也支持以往文献对相对剥夺感的研究结论^⑧,即一般来相对剥夺感越强,其对社会政治形势的判断越消极。

社会剥夺指数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在模型中显示了与预期相符的符号。首先,模型(1)显

示,源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社会剥夺指数对居民对政府公正施政状况的判断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受剥夺程度越高,评价越消极。同时,模型(2)还显示居民受剥夺程度越大,其对政府对社会基础设施提供评价越低,充分反映了社会福利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分割的态势。当然,模型(2)中仅在10%以内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本文实证中排除了离退休及失业样本,一旦加入这些样本,有理由相信显著性会有所增强,因为就业状态不仅显著影响居民收入水平,且因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与就业单位高度相关,所以对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以至考虑到离退休或失业样本后社会基础设施系数会有所提高。模型(3)、(4)回归系数为负,不大且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无论是社会安全、环保还是致力于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政府此间的公共政策要么是具有很强公共品属性,要么就是它是生活中的他者(如环保),以至于社会大众感官差别不大。最后,模型(5)显示,总体而言,受剥夺程度越高政治态度越消极,支持本文的基本假设。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商品市场先行发育,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缓慢演进的。理论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越大,人们越有可能认识到个人努力对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越小,从而能在弱化激励的同时,诱发出对政治体系的不满^⑨。以中国市场体系演进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为背景,在运用CGSS2005数据进行职业阶层划分,并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测算社会各职业阶层的受剥夺指数的基础上,本文检验了源于劳动市场分割的剥夺效应对居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初步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进一步,转型路径选择)与居民政治态度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联。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是通过排斥运动和等级制两个途径实现的。排斥运动中以一职业阶层或部门设法阻止其他人进入该职业或部门为特征^⑩,等级制以一职业阶层或部门对他人有约束的吸纳为特征,两者不仅造成城乡、职业、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等部门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而且还削弱了社会流动性。而如果这种分割又主要是由正式制度介入造成的,那么必将在居民对公共政策的态度中有所反映。本文实证基本支持这一假设。

居民政治态度研究对转型经济国家有重要意义。首先,居民政治态度不仅是一个国家政府绩效的具体反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一步转型成败的关键,因为只有获得社会的普遍支持,诸多推动进一步转型的政策才能低成本地得以推行。其次,政治态度往往与政府的合法性与政治行动相联系,积极的政治态度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否则社会则可能陷入不稳定状态,这也是已有文献通过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度来预测未来社会稳定状况的合理性所在。本文的启示在于,转型经济要努力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选择一条能够普遍惠及社会各阶层的转型道路,以为进一步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迈向市场经济转型迄今已过30年,劳动力市场分割却依然存在,并且有加大的趋势,已经并将继续对居民政治态度产生消极影响。为此,务必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使发展有赖人民群众并最终惠及人民群众。

(作者单位:李明,复旦大学经济系;潘春阳,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苏晓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有关俄罗斯政治资本主义和贫富差距的证据可以得到很多经验材料的支持。王小鲁通过福布斯和世界银行数据比较了俄罗斯与中、美两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比例与富豪占比的情况,发现俄罗斯富豪占比与其经济占比极不对称。见王小鲁:《三十年改革及中俄转轨路径比较》,《比较》,2008年9月,第46页。

施莱佛的研究表明,较之于俄罗斯波兰的转型更为成功,而俄罗斯政府失灵、社会资本和市民社会发育不足以及初始条件差异等并不足以解释这转型绩效的差距。于此之外,俄政府绩效欠佳是理解问题的一个关键。见施莱佛(1996):《转轨中的政府》,载施莱佛、维什尼编著:《政府病及其治疗:掠夺之手》,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97~221页。

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这一特征,与英国现代化早期通过圈地运动推动劳动力市场形成的机制不同,也使得中国农民在早期成为改革的绝对受益者。

Shi(2006)的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早期劳动力以乡镇、村为目的地流动占63.4%,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占36.6%。见Shi Anqing, 2006(April), "Migrations in Towns in China, A Tales of Three Province: Evidence from Preliminary Tabulations of the 2000 Censu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890.

1984年国务院发布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小城镇,使城乡间持续26年的分割开始松动,城乡劳动力市场才开始正式互动。

以武汉城市劳动力市场为例,杨云彦和陈金永(2000)发现,户口登记状况对劳动力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表明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决定存在明显的分层。此外,谢桂华(2005)也发现,户籍身份和面临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是影响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经济地位的主要因素。

见陈钊、万广华和陆铭:《行业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

入差距成因》,复旦大学2009年工作论文。另外,尹志超等(2009)也证实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间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持续扩大。见尹志超、甘犁:《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距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第129~140页。

世界银行(2004)通过各省工资协方差的历时变化,考察了改革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情况,得出的结论与我们这里采用变异系数得到的结论类似。见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Bian等(1996)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能够参与单位的决策过程,那么其职业编码即可归为拥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并不限于占据行政管理职位的干部,也包括协助了他们工作的辅助性职业,我们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和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中加入对办事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的调整遵循了该逻辑。

我们的分类结果更接近社会认知中转型过程中各社会阶层获利情况的分布:根据中国全国社会调查数据的调查结果显示,约41.1%的受调查者认为转型中受益最多社会群体为国家干部;相应地,认为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获益最多的受访者占比15.4%;认为农民和工人获益最多受访者仅占1.8%。

Démurger等(2009)运用CHIPS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职业进行过分类,它们的分类结果中同类职业阶层收入的变异系数普遍大于我们的结果,也能侧面证明我们分类的有效性。

①国内学者吴愈晓和吴晓刚也采用过该方法来考察城镇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的关系。

②东部地区分类参照了张军、高远等(2007)的分类方法,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取1,其余地区取0。

③依次为:小于3年记为1,3年以上未完成小学记为4,小学记6,初中以上但未毕业记7,初中毕业记9,高中以上但未毕业记10,高中毕业记12,中专技校记13,大专非全日制记14,全日制记15,大学和研究生(国内就读)记17(国外就读记18)。

④国内学者黄志岭、姚先国(2009)也采用过这一方法。见黄志岭、姚先国:《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第7期。

⑤鉴于对每一问题选无法选择答案的样本都较小,我们剔除了此类样本。

⑥中文版见谢宇、韩怡梅:《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与地区差异》,载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第464页。

⑦胡联合对张翼研究的一个批判即涉及后者的指标选取。以收入水平为例,胡认为行为收入人的变动轨迹较绝对收入水平对其政治态度可能有更显著的影响。见胡联合:《政治学最高法则下的中产阶层“稳定器”战略建构:兼与张翼先生商榷》,《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38页。

⑧相当多文献揭示了相对剥夺感对增强怨恨感、克服集体行动逻辑最终诱发社会冲突的作用。比如Gurr T.R., 1970, Why man Rebel,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⑨Tumin(1957)对社会向上流动社会群体的政治态度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向上流动社会群体会产生一种对既有政治体制的无限敬崇之情。转引至Jackman M. R., 1972, "Social Mobility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Force*, Vol. 50, No. 4, pp. 462-472.

⑩曾群和魏雁滨分析了社会排斥与就业的影响,他们分析的逻辑沿劳动力市场排斥主要是从失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引发社会排斥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的。见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20页。

参考文献

(1)安德烈·施莱佛:《转轨中的政府》,载安德烈·施莱佛和

市场演进、职业分层与居民政治态度

中国公共管理论坛

罗伯特·维什尼编著《政府病及其治疗：掠夺之手》，中信出版社，2004年。

(2)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陈钊、万广华、陆铭：《行业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复旦大学2009年工作论文。

(4)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态度的定量研究》，《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

(5)黄志岭、姚先国：《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第7期。

(6)胡联合：《政治学最高法则下的中产阶级“稳定器”战略建构：兼与张翼先生商榷》，《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7)赖德胜：《论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经济科学》，1996年第6期。

(8)李建民：《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及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9)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10)李培林、张翼：《走出生活的逆境的阴影：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人力资本失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1)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多元动力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05(a)第4期。

(12)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b)第5期。

(13)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14)梁玉成：《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世界银行：《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17)Sylvie Démurger、Martin Fournier、李实、魏众：《中国经济转型中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管理世界》，2009年第3期。

(18)Szelenyi, I., 1996, "The Market Transition Debate: Toward a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pp. 1082-1096. 中文版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

(19)王小鲁：《三十年改革及中俄转轨路径比较》，《比较》，2008年9月。

(20)王丽萍：《政治心理学中的态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2月（43卷第1期）。

(21)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中文版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2)Xie Y. and E. Hannum, 1996, "Regional Variation in Earnings Inequality in Reform-Era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1, No.4, pp.950-992. 中文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

(23)谢桂华：《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24)杨云彦、陈金永：《转型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竞争——结合武汉的实例》，《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5)尹志超、甘犁：《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工资差距的实

证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26)张军、高远、傅勇、张宏：《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

(27)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8)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9)Bonacich E., 1972, "A Theory of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5), pp.547-559.

(30)Blanchard O. and A. Shleifer, 2001,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 vol. 48, pp.171-179.

(31)Bian, Y. and J.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1, No. 5, pp. 739-758.

(32)Cotton, J., 1988, "On the Decomposition of Wage Differential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LXX (2), pp. 236-243.

(33)Dougherty C., 2005, "Why are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Higher for Women Than Me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40, pp.969-988.

(34)Fleishman J. A., 1986, "Types of Political Attitude Structure: Result of a Cluster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50, pp.371-386.

(35)Gurr T.R., 1970, *Why Man Rebel*,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6)Jackman M. R., 1972, "Social Mobility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Force*, Vol.50, No.4, pp.462-472.

(37)Lapierre R. T., 1934, "Attitude VS. Actions", *Social Force*, pp.230-237.

(38)Neumark, D., 1988, "Employers' Discriminatory Behavior and the Estimation of Wage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3(3), pp.279-295.

(39)Oaxaca, R., 1973,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4(3), pp. 693-790.

(40)Shi, Anqing, 2006, "Migrations in Towns in China, A Tales of Three Province: Evidence from Preliminary Tabulations of the 2000 Censu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890.

(41)Shi, Xiancheng, 2007, "Monopoly causes Inter-industry Wage Differentials", *China Economist*, pp.53-61.

(42)Tedin K. L., 1974,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on the Political Attitudes of Adolesc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8, No.4, pp.1579-1592.

(43)Wang, Yicheng et al., 2005,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 *Project Office of the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in PRC*, (www. Ksa.de/China).

(44)Wright E. O.,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5)Wellington, A., 1994, "The Male/female Wage Gap Among Whites: 1967 and 198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9, pp.839-848.